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本科生谈:论文与治学/郑也夫著.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1
ISBN 978-7-209-04367-0

Ⅰ. 与… Ⅱ. 郑… Ⅲ. 社会学—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Ⅳ.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9285 号

责任编辑:王海玲
封面设计:周云龙

与本科生谈:论文与治学
郑也夫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装

规　格　32 开(155mm×220mm)
印　张　6
字　数　118 千字　插页 1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
印　数　1-5000
ISBN 978-7-209-04367-0
定　价　1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0539)2925659

目　录

第一讲　读社会学有什么用 …… 1
第二讲　怎么读书 …… 24
第三讲　学术与日常生活 …… 49
第四讲　选题的智慧 …… 69
第五讲　叙事与理论 …… 89
第六讲　深度访谈 …… 110
第七讲　文献搜索 …… 129
第八讲　论文体例 …… 142
后　记 …… 154
附录一　深圳演讲后答同学问 …… 159
附录二　三校论文选编前言 …… 168

第一讲
读社会学有什么用

大家好,走进本科同学的教室,和大家对话,非常高兴。说过这句话后,特别别扭,觉得这句话大概不能令同学们信服。这学期刚开始,这是第一周,我们上过的课大多都是第一节, 可能上节课的那位老师的开场白也是:非常高兴来给同学们上课,可能下节课老师还是这么说。这成了一句套话。我想说,我不是在说套话,我是由衷的,但即使这么说仍然觉得苍白无趣。于是我发现面临一个问题,怎么论证这是我的真实想法?这是个不小的困难。我想同学们日后要做的很多工作,都是通过论证让人家信服。你怎么表述、怎么论证?我先试试。大家听仔细了,看看我怎么论证我前面说过的话:我来这里给本科生上课心里特别高兴。

德国有一个大社会学家叫卡尔·曼海姆。曼海姆概括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差别,当然这种概括好多大社会学家都做过了。曼海姆说,传统社会的特征是确信,准确地说,传统社会的精神领域里的特征是确信,而近现代社会的特征是怀疑精神的崛起,人们不像过去那么确信了。不是说近现代社会的人们不再确信他的父辈曾经确信的某种学说、某种思想、某个信念,而是说,干脆,确信这样一个特征从我们的精神领地当中日益衰减。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很难确信了,相反我们滋长了很重的怀疑精神。那么怀疑精神给怀疑者带来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使怀疑者们的精神处于一种悬置的状态,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其实这个滋味不算太好受。但无可奈何,我们很难再像父辈那样,执著地确信某种东西了。我们觉得一个个学说怎么多少都有点毛病呢。我们就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曼海姆接着说,多数人一生当中,总有一个时段,其精神处于悬置状态。哪个时段呢?青春期。那时其精神处于狂飙期,他不愿意领受父辈告诉他的很多道理。他要去发问,他问这事情怎么这样啊?怎么如此不公道?如此荒诞?这和他的前途可能有关系也可能没关系。但是这些疑问使少年的内心变得很不安定,他怀疑父辈对他的很多教导,他要重新审视。曼海姆说,这是人生一个阶段的特征。当青春期度过以后,当他们找到了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以后,他们就走出了那个悬置的状态。他可能成了一个体面的白领,过循规蹈矩的生活,思想不再像以前那么疯狂,那么好怀疑。那一段岁月对他们有什么用呢?那段精神狂飙期,拓宽了他们认知的视野。尽管以后循规蹈矩,但那段精神上不安分

的岁月,帮助他们吸收了很多异质性的知识营养,对他们一生好处莫大。多数人一生只悬置这一段时间;只有少数人,很稀少的人,终生精神上处于悬置状态,不太是滋味,但没办法。这一小撮人是怪物,我们称之为“知识分子”。很不幸,鄙人就是这一小撮怪物中的一员。这些人终生处于这样一种悬置状态,很难踏实地依附在某个观念之上,和它结成一体,虔诚地笃信某种观念,终生不渝。很难做到。那么对于我们这样的人,生活的最佳地点在哪儿?最好的社区在哪儿?就在这里。为什么?我们置身在社会的任何其他角落,人家会说我们有病:这事和你利益不相干,你这么兴奋干什么?你关心这些事情作甚?对于我们,只有此地才是最好的场所。为什么呢?因为,在座的诸位精神上同样处于悬置状态。上天赋予你们这段时期,不太容易相信,愿意重新思考一些事情。我们是一些怪物,终生这样。我们把我们的一生放这里,跟你们的一个时段相契合。你们走了,你们日后变得越来越安分。又来了一拨儿不安分的新生,年龄使然。这样,一个不安分的老少年跟一群不安分的少年凑到一块儿了。你们成了我的保护带,在这儿我不会遭到耻笑,被怀疑有精神病:怎么老大不小了,总关心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在这里不会,不但不会遭到耻笑,偶尔还能赢得一些掌声,实在令我们亢奋不已。到这儿来,不是工作,到这儿来像游戏一样高兴。

同学们根据学历的不同、年龄的不同,分为三段: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为什么说今天特别高兴呢?博硕们,随年龄的增长,城府越来越深,童言无忌在他们身上消磨得越来越厉害,求知的天真也贬值得很厉害。我听说美国很多大牌教授最愿意

给本科生上课。现在从教委到我校都在提倡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像我这样的人不用提倡,我高兴来上课。我非常理解国外那些大牌教授为什么特别愿意给本科生上课。你们身上带着一种天赋,这段年龄求知欲最旺盛,最富怀疑精神,这段年龄最没有禁区,勇于指着老师鼻子去争论,还没学会客套。

以上是我的开场白。我为到这儿来在本科生的课堂里讲课而高兴。这不是客套话,我高兴的缘由可能和别的老师不完全一样,我为自己作了一个特别的论证。

下面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北京市出生的人,但祖籍不是北京,祖籍已经不可考了。因为祖父很小就父母双亡,只知道其父母从山东来到东北,具体的籍贯不清楚。祖父幼年在东北盲流。我是 1950 年出生,在本市念小学、念中学,念到初中三年级的时候遭遇“文化大革命”,在学校又滞留了两年。共度过了 5 年,却只是初中毕业。以后去黑龙江农场,68 年去,77 年回来。后考学,读过三所学校,获得过两个学历。77 年高考,考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了一年半,中途考研究生,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系,获哲学硕士。毕业后开始干社会学。中途又出国一趟,去美国丹佛大学读了一年半。给我的是博士奖学金,读了一半不想读了,给了我一个硕士学位。这是 85、86 两年的事。从事社会学以来,待过四个单位:北京社科院社会学所、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最后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游击队员。北大是不是我最后的归宿呢?人算不如天算。反正我的血管里流动的是一个老游击队员的血液。

为什么要讲这门课?打听了一下,我们系没有这门课,而我

在人大讲过这门课。人大除我以外,也没有人讲这门课。我认为这门课非常之必要。我觉得大学,特别是文科的大学,主要教同学们三样东西:读书,思考,写作。当然除此之外,理工科还要学习做实验。我们还要学习搞社会调查。但是不管任何院系,这三件事大约是最大的三件事。这三样东西当然有各自的独立性,但是应该说,论文的写作是最综合的。也就是说,论文水准的高下实际上也能够折射出你的书读得怎么样,也能够反映出你的思考怎么样,有没有深度,有没有独到的地方。换句话说,如果把写论文抓好了,其他两项也会提高的。反过来说呢,如果书读得不好,书读得不多,思考得不深入,那论文也写不好的。这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事情。我在人大讲这门课的时候,没讲这么长。一个学分,16 节课,我讲 8 次。我原本还想这么讲,但我校在这方面规定得比较死板,最短的课程就是一周两节,16 周 32 节课,那就扩大吧。扩大以后,其实题目就变了。我说文科学生学三件事嘛。我这门课以讲写论文为主,除此之外,还想谈谈怎么读书,怎么思考。所以,课程题目也变换一下:“论文与治学”。我们这一学期的课,是 8+8。我要讲 8 周 16 节课。你们每人报一个论文题目, 我们用其余的时间, 将每个同学的题目讨论一遍。

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第一讲:学习社会学有什么用?

一、喜欢和有用

首先讲这样一对概念:喜欢和有用。喜欢和有用是不同的,为什么可以放在一块儿说,是因为喜欢和有用和一件东西结合

到一起了。什么东西? 喜欢和有用往往可以成为某种行为的动力。你为什么这么努力学习?可能是因为你喜欢,也可能是你觉得它对你找个饭碗有用。这是小而言之。大而言之,你觉得学这个东西可以经世济民,你有很大的抱负。喜欢和有用实际上差别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呢? 大到一个人特别喜欢干一件事情的话,会变得很盲目,有用没用这事也要干,有用没用这书我也要读。一个特别喜欢的人绝对不管这事是有用没用的。我经常嘲笑那些电视台的记者们,他们在采访中常会问人家: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件事? 这话不通,不能这么问,喜欢是没有为什么的。这么问实际上是接近于一种愚昧。就像我问你:听说你挺喜欢吃苹果的,为什么喜欢吃苹果? 我怎么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吃苹果?我身不由己。对不对啊? 我就是爱吃苹果,没办法啊。就像你问一个小伙子说,你怎么老爱看人家漂亮姑娘啊? 为什么? 我怎么知道为什么?痴迷一件事情,是没有为什么可问的。你想想是不是这样的道理。相反,你怎么样得到苹果,你怎样源源不断地拥有苹果?这样的事情是可以问的。而至于为什么喜欢,说不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根本把握不了我自己。喜欢了某一种行动,喜欢了某本书,喜欢学习某项手艺,痴迷于某项手艺,这样的人都容易陷入一个盲点,就是不打听有没有用。小孩就愿意踢足球,踢足球有什么用? 不知道,那太理性了,没想到这个事。当你给他编织出一番道理说,有这个用处,你编织得不见得对。你说健身,他踢球当中骨折了。你看鄙人这副样子,小时候我就愿意上跑道和人家去拼。遭遇困难时期,却练中长跑,成了年级冠军。实际上那时候还没吃饱饭呢,锻炼身体还不如不练

呢。不练能比现在个大一些,能比现在身体更好一些。有些事你不是为了有用。大人告诉你有什么什么用,那是胡说八道,当事者做这件事不是因为有用,是因为喜好。不错,我们可以深入地分析有什么用处,可能是有用的。其实最愿意执著地追问的人,或者是不喜欢的人,或者局外人。局外人很冷静。

咱们学社会学干什么呀?这问题问得很认真。这问题绝对要理论,他所以这么执著地要问,可能是因为他不喜欢。因为不喜欢,发现了一个问题。喜欢的人不问。那我首先要跟你说的是,这件事如果有用,但是你不喜欢,对你不合适。我说的有用既包括经世济民,又包括日后可以成为你的饭碗。假设学这个挺容易,日后还挺赚钱,但你仔细想想,如果你不喜欢,我劝你如果还有别的出路,去找一个你喜欢的,把那个作为你的饭碗,你做起来很愉快,也就容易做出点样子来。相反,说起来还挺有用,可是想来想去还是不喜欢,能不干尽量不干。换句话说,喜欢才能做好,不喜欢就转业吧,有业可转,别在这儿委屈了。

喜欢还可不可以问有用没用呢?当然可以,不能说盲目就好。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明白学。老盲目行吗?不行。你再喜欢,也可以理论理论这件事有没有用。还是不喜欢的人帮助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二、社会学有什么用

下面谈一谈社会学有什么用。毫无疑问,在座的各位日后会分流,一批人日后会以社会学为饭碗,另一批人日后将告别社会学。这两种人是什么样的比例呢?依学校的不同而有别。水准比较低一点的学校,可能学社会学的大批学生以后不会作社会学研究,会到政府机关、媒体、企业等等,五花八门。相反,比较优秀的院校里面,社会学系的学生日后从事专业社会学研究的人的比重比较大。大到多少呢?我不知道。我想这个调查可以作为一个本科生乃至硕士生论文的题目。谁能说得清楚?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搞清楚这事实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怎么没有意义?绝对有意义。搞清楚并不难。比如说,搞清我校从办社会学系以来,各届本科生、硕士生的流向,多少人干社会学,多少人不干社会学了,不干社会学里面还有分流。其实除了社会学以外,别的学科一样,学这玩意不见得干这玩意。这些都是尚未搞清楚的基础事实。绝对值得作一个调查,作一篇论文的。这是一个小话题,关于选题的一个小话题。

我们接着说。两种人关于有用没用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一样的。对于以后还要干社会学的人,社会学有没有用,这实际上是等于在问这样一个问题,这项工作对社会有什么用?这项工作如何经世济民?对另外一部分人呢?他们四年学业结束后,可能进政府,可能进媒体,可能进企业。对这些人来说,这四年,要学也得学,不学也得学,反正上了贼船。对他们来说,学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这对日后干别的工作、对增长工作能力有什么帮助呢?对日后找一个非社会学的饭碗,有什么帮助啊?这些是我要给你解答的。也就是说,我们把前面那个有用没用的问题转化成两个问题:一个是社会学对社会有什么用处;另一个是学习社会学对扮演别的社会角色,比如企业家、官员、新闻人,有什么帮助。

我想说,学习社会学是在学习一种思考方式、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我前面说过,曼海姆说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确信,近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怀疑精神,而且这个基本特征越来越突出。不确信了,和传统社会告别了。为什么传统社会发育出了这样一种特征?因为那个社会是个静态的社会,变迁很小。在一个变迁很小的社会里面,父辈的经验大致上说可以指导你的生活,因为你所生活的社会和你的父辈生活的社会没什么大的变化,没什么大的差别。就像一台戏,戏词不变,演员越老戏词越熟。戏词老变,老演员就没什么优势可言。

有句俗语早就走入学术界了,特别是经济学家老爱说:"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这句话放在传统社会里面正确的程度更大一些,放在近现代社会里面,就不再是这么回事了。我们在阳光底下越来越遭遇到一些新鲜事,真的是太新鲜了。比如说同性恋可以结婚。同性恋也不是什么阳光底下的新鲜事,以前就有。有人说这是一种生理现象,但是过去没有同性恋可以结婚的吧?可能再过不久就克隆出我们的兄弟姐妹来了。这是新鲜事吧?绝对是。同学们动脑筋想一想,能想出一些新鲜程度非常大的事情。阳光底下有新鲜事。正因为阳光底下有新鲜事,所以呢,传统社会中父辈的一些教导不能完全地指导我们的生活,于是我们不得不对他们的教导产生怀疑。不是他们的教导错了,而是社会变了。剧变的社会导致人们思想方式、价值观念发生变化。

社会学捕捉和认识这种变化,强化了一个概念叫反思。反思是现代社会的特征。现代社会为什么要反思呢?现代社会为什么不能牢记一些教条,在其指导下去生活呢?因为父辈的很多教条指导不了我们今天的生活。而我们自己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在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不知道该怎么走。那么怎么办呢?走几步回头看一下,反思一下走对了没有。要是走错了赶紧换路。我们不得不往前迈三步回头张望一下,再盘算盘算,乃至坐下来讨论讨论:走对了没走对?这就是反思。反思是因为没有现成道路可走了。要是有现成道路可走,不需要反思的,反思干什么?也没有太多可讨论的。有太多可讨论的是因为有疑问,社会剧变造成了太大的疑问,这些疑问从祖宗的书里找不到解答。所以现代社会的剧变产生了反思,产生了讨论。讨论非常之必要。我写过一篇杂文《为争论辩护——驳王蒙"不争论的智慧"》。我这个杂文写出来以后,好多老朋友,很久不联系了,打过电话来,说写得好。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找这篇文章读读。讨论是必要的,为什么是必要的?说到根本,这个社会没有一个定论告诉我们前面路该怎么走,我们不得不张望、徘徊、议论,乃至争吵。

社会学是一门帮助我们解释周围的事情的学问。马克思说过一句名言:哲学家的任务是解释世界,我们的任务是改造世界。这句名言,且不说后一半,后一半是马克思的一种雄心和抱负,其实前一半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哲学家的任务是解释世界,社会学家的工作同样是解释世界,解释这个社会。古典时期,哲学是万流归宗的,包打天下的,哲学家通通都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是到了近代,学科划分越来越细。我们社会学家特别要解释一些社会问题。而像思维这些东西,就已经不是我们的专

长,可能是哲学家、心理学家的事情了。脑子里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观念的人,特别明白建设这个世界,改造这个世界,他们不大明白解释有什么用处。我不是说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社会学有什么用处吗?我说社会学的一个用处就是解释这个社会。解释这个社会有什么用啊?你要说解释有什么用,你应该先了解人类精神世界的特征。我要告诉你,人是需要对周围这些事情进行解释的。人要是对周围的事情丝毫不作出解释,会精神分裂的。耸人听闻吧,不至于精神分裂吧?差别只是程度,一点解释都不要是不可能的。你绝对要求很多解释,这些解释能够使外部社会在你的脑子里有了秩序,不再是混沌。外部世界,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际关系,如果在你的脑子里是一个混沌,你非精神分裂不可。你一定要作出一定的解释。如果这个人有哲学家的癖好,他需要的解释太多了。而那些和哲学距离非常遥远的人,非常务实的人也不是一点解释不要。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需要解释。我们去医院看病,大夫用听诊器,试表,化验,然后再写方子开药,拿药之前,你多半还要问大夫:我怎么了?你问什么?吃药就是了。提问不就是让大夫给解释解释吗?你听他解释干什么呀?解释能治你的病吗?解释在一定程度可以帮助你治病。因为要是没有这个解释,你不安心,你要闹个明白。你觉得弄明白了,才不枉做了21世纪的一个人。我这么高学历,怎么看了病以后什么都不知道就走了?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也没什么。但是不成,还很执著地问人家,甚至大夫回答后,你还问:大夫,我还没明白,那您说的那个词什么意思啊?我们说很多好大夫——当然庸医更多了,都不希得给你作这个解

释——不知道解释对人是何等的重要,不懂得人性。人有病不是光吃药的,还需要解释。药物和解释一起,作用于你。这样务实的一件事情——看病,你都要讨得一个解释。除此之外,你的一些社会遭遇,你受到不公正待遇,你遇上一个案子,有人坑害你,有人婚变,等等,遇到的很多很多的事情,人们只是程度不同罢了,都是要讨得一份解释的。也就是说人类有这种需求。我们说,有一种需求就会有一种供应。关于社会问题要讨得解释,谁是供应者啊?我们是干这个专业的。批发还是零售,这儿都有。这里提供大的解释给你,这里的解释可以高屋建瓴,这里的解释可以醍醐灌顶,这里专门干这个的,这里有深入的研究的。你别去听那些,那些人都是业余爱好者,是江湖人,他们只有三言两语。我们这儿可以是从根到梢、从头到尾地来给你解释。有的时候,人们对很多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给出一些说法来了,那我们和他们的差别是什么呢?我们是学院派,我们跟他们的差别是我们不光要给说法,我们的说法要有更多的根据,我们要提供一些有更扎实、有根据的说法。

我们执著地给人家拿根据,执著到已经有学究气了。我的开场白是个玩笑,日常生活还不至于这样较真。但是我们是要拿出根据的。为什么我来这里讲课特别高兴?得说出一些道理来。你小时候参加考中学考试,考算术,一道应用题让你算。你把数说对了给你分吗?不给,要看你的计算过程,如何得到这个数,要有中间的过程。如果中间的过程对了,最后一步算错了,10分仍然给你7、8分;把这个数蒙出来了,中间没有论证,一分没有。要学会论证。要有参照系,看待社会现象,要有很多参照

系。比如说离婚问题,今年离婚率高还是低,何以见得?今年的离婚率和70年代的离婚率比,跟50年代的离婚率比,跟美国的离婚率比,跟韩国的离婚率比,跟我们同血脉的台湾、香港的离婚率来比,这样一比,不说别的话,你就获得了一定的认识。就是说我们这些学科要教你去解释周围的事情,帮助别人提供解释,还要有根据,有论证,还帮你建立很多参照系,去对照。我最终要说的是,对于一个日后不干社会学专业的人来说,学这些东西也不失为一种收获。你学了四年之后去干别的,那里的人大多数不是出自于社会学,而你出自于社会学,你吸收了一些和你日后主业并不直接相关的学科的知识。这些知识在你漫长的一生当中,可能有相当大的好处。

我们有一些同学可能会转行,去学别的学科,或是不再做学问,做实际工作,很好。每人有每人的选择,因为每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特长是不一样的。每个人要认识自己。刚才我上课之前,和一个去年选了我课的本科生在聊天,那是一个很出色的本科生。学那门课时,是少数得分最高的人,是艺术系的孩子。他已经四年级了,他说他不想学这个学科,对这个学科毫无兴趣。考大学就是误会,他本来想学理科,但给老师劝到文科去了,最后进了艺术学院了。很多人巴不得,求之不得,但他不愿意学。我问,今后怎么办呀?他说不知道。我说你慢慢来吧,这事苦思苦想也想不出来,最好是随着时间的经历,有一天不知不觉地豁然开朗了,看到了喜欢的东西。认识自己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情,要慢慢地认识自己。他很迷茫,下一步是工作还是保研也不清楚。他说他可能上大西北去支教一年,然后回来再

说吧。支教一年的经历也可能让他不知不觉地确定了自己的兴趣爱好。认识自己是一件挺要紧的事,认识自己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认识自己,凭的不是智力,凭的是什么东西?说不清楚。

学习社会学有什么用?社会学是一门视野比较宽阔的学科。我们近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分工”。分工越来越细致,到了画地为牢、老死不相往来的程度。它给我们带来的收获是很大的。亚当·斯密说要做一个扣针有多种分工,自然提高了效率,可是最终造成人们眼光的狭小,这个弊病也是很大的。而我们这个学科,遭遇到这种病症的程度比较低。你学了几年,是不是有这样的体会?因为我们学科的特征是比较宽阔,你进入社会生活后会术有专攻,但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学得比较宽的话,其实是有好处的。我们有个刊物叫《社会学家茶座》,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的,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我的一个朋友王焱是这个杂志的执行主编。他在最新一期上写了发刊词《暧昧的社会学》,社会学这个学科真的有这个特征。同样是社会学研究者,互相做的工作可以说天差地别。比如说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潘绥铭教授作的研究跟我作的研究,表面上看几乎是两个学科的。潘老师指导学生搞调查,自己的调查更不要说了,是一流的,非常深入。调查的本领是社会学的看家本事。这个学科里面有共性,一脉相传。拿潘老师的东西和别的优秀的经验调查相比,你会看到有一种神似。在现代社会科学的学科当中,差异像社会学这么大的,可能就是心理学了。除了心理学, 我还想不出来哪一个学科能像社会学内部的差异这么大。差异这么大,可以说这个学科不成熟,姑且可以这么说。但

我同时也觉得差异大对于学科中人来说，不失为一种好处,没有很大的约束。如果走到经济学的程度,不上数学公式就别想评教授,因为否则根本就进入不了经济学的核心刊物。我们学科的专业化没这么强,门槛没那么高。我们这个学科给我们的自由度非常大,给我们思想的自由度非常大,给我们作为一个思想家的自由度非常大。有些东西机械地搞成数学公式,反正你唬别人唬不了我。我这个人是悬置的,终生悬置着,不太容易被忽悠。在美国,跟经济学中搞得不错的华裔学者交流。我说,你们小菜做得挺精致的,但对于大问题,怎么变得越来越淡漠了?他们无言以对,他们要应对美国学术界,要生存。于是学术走到那一步,非常之精致,非常之窄小。我们现在置身这样的学科,而不是那样一个学科,在相当程度上不失为一种福音。

对于今后不作社会学专业研究的同学,学习社会学有什么用处?这个学科还教你作一些社会调查,这是看家的本领。这个本领今后可以服务于多种工作,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对社会调查的需求越来越大,原因还是前面说的,社会处于剧变。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这是我们的家园,可是这里面发生的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可能你有兴趣了解,每个人都有好奇心。他们能挣多少钱?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呀?他们在做着什么样的勾当?但你不知道。所以,整个社会有一种旺盛的需求,就是搞明白我们社会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商家要搞明白,商家要作商情调查,商家对社调不是特别在行。统计学是一门学问,而统计学必须跟对社会有深刻理解的人结合,如果对社会没有很深刻的理解，运用统计学时连需要调查的条款都不知道。商家有这样的需求,政府有这样的需求,公民,媒体都有这样的需求。我们的媒体做的工作差得远,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大批的学过社会学的人才进入媒体,把社会调查搞得更像样。所以说,日后你不做社会学的话,学这学科也还有这样的用处。

三、学进去,就是改行也有收获

你现在在这里学习,以后当然可以改行,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有很多观念陈旧的人认为,学非所用,干非所用,非常不好。其实,你去统计一下发达社会,有很多人学了以后不做。学了以后不做,对该人的成才未准就没有帮助。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不易分析的事情。但我想原因之一是,从不同的学科中学到了一些共同的东西。所谓共同的东西就是它教会了你读书,教会了你思考,教会了你写作。尽管读的东西不太一样,但是你读书的能力强了。原来读一本没有学习过的很厚的书要读两个月,后来读一本没有接触过的东西一个月就够了,你读书的能力提高了,你思考的能力也提高了。原来学这个,后来改行了,但是你的思考能力并没有衰减。比如原来你是受物理学训练的,后来搞化学了,假设你和另一个人一同进入化学领域,受过物理学训练的这个人和没有受过物理学、也没有受过化学训练的人相比较,可能前者的优势是很大的。为什么优势很大呢?因为所有学科的人不知不觉地锻炼了一些共同的能力，阅读、思考、写作、实验,尽管实验跟实验不一样,但做过此一实验然后再做彼一实验,上手来得快一些。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改行不是一件太要紧的事情。而这个代价,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必然的。

我们要认识人性,因为每一个个体认识自己的兴趣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不是一上来就能认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只要是一个有规模的人群,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代价不是很重,因为毕竟学了读书,思考,写作,乃至你学会了自己找书读,像这样的一些能力都是很要紧的。

四、为无用之学辩护

我要讲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讲有用和没用的关系。对一个太信奉实用主义价值观的人来说,肯实认为我们的学科没什么用,而认为学经济,乃至于学广告、学会计,更有用,或者学工程,那才是更有用的。所以有必要和大家一起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记得有一年"五四",好像是八九十年代之交,那时候我还不是北大的教师,北大学生会把我请来,参加一个座谈会。我记得站出来一个学生,慷慨陈词,说学校应该为社会服务,学校学的东西应该是直接服务于社会的,学的东西要有用处,我们有很多没用的课程学它干什么?因此学校要改革。我有些听不下去,就接着他发了言。我说,要是照着这个同学的话,清点一下北大,是不是好多院系应该撤掉呢?学梵文干什么,学考古干什么?算来算去,我们学校好多院校可以取缔。好多你以为有用的院系,仔细看看,还是没用,很多数学成果不知道怎么应用,500 年以后才能用上呢。数学今天的前沿成果,500 年以后才能应用呢,做它干什么?我们的人民还没吃好饭呢。这个同学提的,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问题。荒诞之处在于,在这个校园里居然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这个校园里这个问题居然没解决。我们如果只搞立竿见影的学问,我们的知识,我们整个的文化积累将是何等地狭窄。我们上不了天,入不了地,不通古今,就知道眼下身前。我们大学是干这个的吗?大学不是干这个的。所以说,最后一个观点,有用没用要和大家深说一下,进一步把前面所讲的东西总结一下。

诸位,科学研究的动力是什么?科学家走入科学殿堂的动力是什么?我说不是追求有用,乃至于不是为了经世济民,是受他的好奇心驱使,他没有办法,只有去从事这样的工作,不然自己无法解脱。为什么说不是为了有用?他不能告诉我们用处在什么地方。还不像我,今天可能一定程度上告诉你社会学有什么用了,你听了以后,觉得还有一点道理。有些人牌头比我大多了,成果比我高多了,你问他那些成果有什么用啊?一问一个准,说不出来。你问爱因斯坦,相对论有什么用?说不出来。你问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有什么用啊?说不出来。像这样比较过硬的例子还不能帮你说明这个问题吗?他们进入科学领域,不是为了有用,不是为了追求有用,是兴趣和好奇心所驱使。

是有用的东西对人类的用处大,还是无用的东西对人类用处大呢?你会说:老师,你这话有语病,无用的东西还怎么有用?问题就在这儿呢!眼下无用的东西日后可能有大用;眼下有用的东西,对我们充其量是个小用。庄子说:"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他说,你老说有用没用,你脚下踩的一块地方是对你最有用的地方,你把你脚下没踩的地方都去掉,怎么样?你就像站在山头上一样,寸步难行了。如果我们把很多无用的知识都扔掉,我们就不能在这个世界上立足。

不久前去世的华裔大数学家陈省身先生，曾作过一个演讲，非常生动。他在演讲开场白中说，欧几里得在两千多年前提出这样一个说法，说空间中只存在着 5 种正多面体，多一种也没有，就这 5 种。大家都知道这 5 种都是什么样的吗？第一个是正四面体，就是三角底面；第二个是正六面体，就是正方体；第三个是正八面体，两个四面三角形上下接在一块；第四个是正十二面体，五边形组成的；最后一个呢，正二十面体，二十个三角形组成的。陈省身说，欧几里得在两千多年前就说有一种正二十面体，可以给你画出来，可以给你捏出来，你看，真漂亮。我看见这篇演讲后，重温了一下少年时代的几何学习，拿纸在家里拼成这 5 个正多面体，现在还挂在我屋里。陈省身说，在大自然当中，两千年来一直没有看到一个自然的，或者是矿物质的结晶，或者一种生物，它的形状是正二十面体。这意味着什么呢？正二十面体只存在于人的思维当中，不存在于真实的自然界当中。但是到了两千多年以后，我们终于在真实的世界里面看到了正二十面体，这个真实的世界里存在的这个正二十面体和欧翁脑子概念里的那个正二十面体遭遇了。至少我们就可以说，欧翁当年那个大脑里构思出来的这个正二十面体，未准对人类现实生活没有用途，只是长时间以来一直没有派上用场。大家知道在真实的世界里存在的这个正二十面体是什么东西吗？SARS，病毒，那个病毒非常非常小，它就是一个正二十面体。就是骚扰中国社会、令无数人病倒的那个 SARS，它又有了一定的变异，冠状正二十面体，就是每一个面上还长出了一个小的冠状。前沿的数学成果，要在多少年后走向应用，造福于社

会呢？通常是三五百年吧。有些几乎永远不能走入实用。这样的例子很多，哥德巴赫猜想就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造福于人类。那么直接做这个事干吗呢？直接做这个事服务于科学系统，服务于数学系统，使数学宝库里面的知识越来越丰富，数学体系越来越严整。但是这个武器暂时和大家的吃喝没关系，乃至于和航天都没关系，和我们最高级的一种应用没关系。它太领先了。

反过来说，最实用的东西也意味着最常规的东西。一亩地多产几斤粮食，多实用啊。中国有个水稻专家袁隆平，他培养的良种每亩产一千多斤，太伟大了。但是如果人类只有农业文明，没有任何别的文明形态，行吗？换句话说，如果人类眼睛只盯着农业，那就连农业自身都发展不了，农业自身的发展尚且依赖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所以说，实际上对我们最有用的东西对我们只有小用处。我们开发了很多很多暂时看起来无用的东西，这些东西最后可能转化成一个个副产品，这些副产品将极大地造福于人类。谁能否认文字的功效？文字原来是干什么的？文字原来是个很滑稽的东西。知识分子的前身是什么？知识分子的前身是巫。什么是巫呢？巫是搞预卜的。部落要打仗，打仗风险太大了。打不打呀？该不该打呀？你来给算一卦，于是在篝火边上烤起了牛的肩胛骨，或龟甲，烤完以后看看那个裂纹，预言一下，然后把它记录下来。记录的那东西叫什么呢？后来叫甲骨文。占卜有什么用处？打胜仗和它有什么关系啊？打胜仗不是取决于膂力过人吗？不是取决于刀刃坚硬吗？它不取决于这些侏儒，算卜有什么用处？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它是当时的无

用之学,但又肯定不是一点用处没有。马林诺夫斯基告诉我们,当水手们遇到风浪的时候,巫术使大家信心倍增,从而有助于他们战胜暴风。没有信心,可能很早就溃败了。所以你不能说巫术没有用。同样,占卜可以鼓舞士气。已经占卜过了,我们是天命所在,这股劲儿便陡然增长。共军战胜国军时,士气没有很大的作用吗?士气为何物?几千年前,士气很可能就被这个天命所在鼓舞了。你能说那事情都是胡说八道吗?要过后地看,以往的意识形态都有荒诞之处,但在当时有实在的功能。下面我要说的是,占卜过后,要煞有介事地记下一些符号。那些符号当时不过是服务于占卜的,但最后走出了一条康庄大道,变成了文字。可以说,文字产生于一种无用之学。如果当年的部落首领都是高度实用的,那就没有巫的出现,就没有甲骨文,也就没有日后的文字。文字出台时用处狭窄,后来才光大。我如果精力和创造力还行的话,日后会努力写一本专著,叫做《副产品》。如果没这么大创造力的话,日后会写一篇长论文,或是作一次演讲,讲副产品。人类的文明很大程度上是“副产品”造就的,不是有直接用途的那些东西造就的。有些东西看起来没有直接的用途,其演绎出来的副产品不得了。

我有很多例子来说明副产品。比如说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印刷术。最初的石碑,立起来干吗呀?为了以正视听,减少口耳相传的谬误。立一个石碑,人们就不远千里跑来,记住碑文。但又担心。告诉别人时口说无凭,他们不信怎么办?就把这碑文拓下来。当初不是为了制作副本。是拓片启发了人,哎哟,这东西还能印刷呢,于是有了雕版印刷。最后为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

献的往往都是副产品,都不是产品,不是直接的目的。

我希望我的观点,我的想法,能够使一部分同学摆脱实用主义的价值观。我相信在座的有些人,深深地陷入实用主义价值观,一直以为学的东西虚了一点,不如学工程,盖起大楼多实在啊。事实上,人类文化宝库里的大多数东西,没有实际用处,但没有实际用处的东西要比有直接实际用处的东西的知识含量大得多,无用之学最后才有大用处。光看着粮食和土地不行。何况粮食就是再多,它是人类文明未来的方向吗?那太小瞧人类了。我们可以从这里举一反三。

“非典”的时候我在人大作过一次演讲,结束的时候说:我半生所学都是无用之学,我愿意为无用之学论证,无用之学才有最大的用处。我说得太多了,大家提些问题,我希望看到我所说的本科生们的年龄优势。

后 记

这本书是我的讲课实录。

这门课讲过两遍。第一次在人大，大约是 2003 年，为 2000 级和 2001 级社会学系两届本科生合开的课程。第二次在北大，大约是 2005 年，为 2002 级和 2003 级社会学系本科生合开的课程。关于时间有些惶惑，说得未必准确，但学生的年级，来的人数，乃至姓名，都清清楚楚。因为有案可查。

我上课规矩大，正式选课的同学每次必须签到。我的博士生劝我，签到会影响同学的选课心理。我不以为然。或许签到体现了我的作风——苛刻，好在我律己之严超过待人。我的性格是少年时代，在对领袖和父亲的双重逆反中形成的。父亲是双重标准，对家人苛刻，对自身宽容。饱受压制中我暗下决心，今生绝不做这样的人。我其实也是双重标准，对己近乎自虐，与之相比，待人简直就是宽容了，虽然不逮时下多数教师那般随和放任。这些年来我课上的一份份签名录，都珍藏在一个牛皮纸口袋中。这是一份特殊的纪念，也寄托着我对自己走过的教学生涯的眷恋。

人大 87 位同学选学那门课程。课的名称叫"怎么写论文"，是一个学分的课程，共上 8 周，每次两节课，共 16 课时。我好像是讲了四五周，另外的三四周用来点评每个同学报上的论文题

目。87 个题目啊,平均每个题目也就是三四分钟。当然时间不是均摊,一番道理可以统摄一些题目,所以点评绝不草率。我很胜任这种大课,享受大课中对同学选题的点评。且做过很多次,颇受同学们欢迎,他们觉得特别受益,比听我讲课还过瘾。说实在话,我很怀念人大的课堂。名校之间,互见短长。普遍来说,北大的学生要比人大的学生学习上更投入,但人大上我课的同学绝对投入。我依稀记得这课上的一些情节。一个同学选的题目是"少年滑板群体",我非常看重,向同学们解析这题目好在什么地方,要采访哪些事情,下课后讨论还持续很久。一个姓孙的女生提出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那问题问得巧妙,微观且深入。问题我已经想不起来,却还记得那位善于思考的同学,可惜不久我就离开了人大,不能帮助她在学术上前行。选材其实比培养更重要,而人才往往发现于点滴之中。当然,这课上发现了多位有潜力的学生。郭茂灿被我推荐到香港科技大学,现就读哈佛。石长慧去了清华。还有一位很有才能的同学,做了书商,仍与我保持联系。我不迷信读书,自认为能向各路英才提供广泛的指导。

我在人大共开过五门课:信任研究,城市社会学,消费研究,生物学对社会科学的启示,怎么写论文。在北大也开过五门,不再讲"信任研究",新开了"幸福导论"。在两校共计开过六门课。

"怎么写论文"是我在北大开的第四门课。本来没有这个想法,是发现很多本科生同学轻视论文,很晚才定题目,而系里一直没有这门课,才毛遂自荐的。我从来不上必修课。如有例外,

就是在人大讲"怎么写论文"——是选修还是必修,实在记不清了。因觉得这课必要,且北大社会学系没有别的教师教,向主管领导建议设为必修课。答复是必修课增加不了,但可以用其他方式促使同学们选课。并说,学校没有一个学分的课,至少两个学分,须上 32 课时,16 周。这是规定,没商量。关于论文我没那么多说的,只好扩充相关内容。于是,一半讲论文写作,另一半谈治学之道,冠名曰"论文与治学"。我当时计划两个年级一同上,我每两年上一次,保证每个同学听到这门课。不知道系里是怎么运作的,最终四年级 8 人选课,三年级 5 人选课,共 13 人。我好像授课 10 周,另外 6 周是点评同学们的选题。12 节课点评 13 人的大约 20 个题目(被枪毙要重选)。因时间极为充裕,不再是我一人点评,而是同学们参与讨论。讨论热闹、好玩、开发心智。一个四年级的李丁,一个三年级的徐晓峰,活跃异常,将个课堂搅得有声有色。李丁有很好的分析能力。徐晓峰则可以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说的不对。私下别的同学告诉我,社会学系老师中他最佩服我。也可能不佩服就不批判了,我算幸运。这样的批评家,对活跃本系空气多好啊。遗憾的是,徐同学去了清华。另一位从此一直追踪我的其他课程的是余前广同学,录音全部是他帮助整理,在此致谢。

北大的授课过程虽也愉快,但"怎样写论文"以及适应本校规则更名的"论文与治学",原本就不是阳春白雪,是希望面对更多同学的课程,只来了这么少的同学,我是很失望的。好在录了音。

整理录音,成书出版,我有过两次。一次是《城市社会学》

(城市出版社,2002),另一次是《阅读生物学札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两书整理的都是我第三轮授课的录音。我一向觉得第三轮最好,前两轮欠成熟,再往后不兴奋。我也极少有哪门课讲过五轮以上。这次超前,第二轮授课就整理成文,自然有过润色和加工。

我相信这门课对同学们大有裨益,但我是不打算开了。需要的同学,自己读这本书好了。授课的好处是有对话,激发思考,加快互动。这次课上和同学的很多对话,对同学提出的很多疑问的解答,都忘了录音。想来不胜惋惜,那一番番话语,换了场景是讲不出来的。出版的好处是传播广。我即使有机会到其他院校授课,选择的题目也会是"信任研究"、"消费研究"、"城市社会学"之类,轮不到"怎么写论文",而眼下空缺这一课程的好像不仅是人大、北大两系。索性终结这门课,放飞这部书,由它来代我寻觅听众和知音。

郑也夫

2007年7月24日

附录一 深圳演讲后答同学问

问:有人说,要少读书多思考,您认为跟您的思想有冲突吗?

答:圣人不是早就告诉过我们了嘛,“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大概要读多少本书,我前面已经告诉你了。我自己的感觉是你们读书没有进入高度亢奋的状态,我觉得你们读书少,如果你读书已经痴迷了,可能才谈得到不要读过了头。读与想要匹配。还是孔子那句话:“思而不学则殆”。我们读书离饱和程度都差得远。但读书有没有一个最佳数量,我觉得是有的。比如说我是属于中等程度的一个人,我读起书来是很疯狂的,比如我在这儿待了一个月,读书已经超过30本了。我现在每天去图书馆,一次借两三本。这30天过手了一遍《史记》,过手了半部《汉书》。但我始终觉得我不适合于读太多的书,比如说,要是我读了陈寅恪先生那么多书,我可能就傻了。你得看自己记忆的容量。但我觉得同学们中多数人根本就不是那个问题。你什么时候一个月读了30多本书?我在这儿就没碰到几个同学跟我交流书,比如关于消费课程方面的书。没有,见不到这样的同学。

问:您分析了中国人不喜欢读书的原因,但分析原因没有多大启发性。如果读书是快乐的,我觉得您的重点应该是说读

书有哪些快乐,引导人认识他原来认为不快乐的读书事实上是快乐的。

答:这个事我没有必要鼓吹,没有必要做广告。毛泽东说:你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你要尝一口。而过去光让你吃苹果了。我说的是你要有选择自由,先要摆出另一些品种的水果。喜欢是一种感受,是一种身不由己的状态,是一种吸引与被吸引。我向你讲了半天梨子也很好吃,描述那滋味,有用吗?

问:您强调读书的数量,但未详细说到读书的结构,即博与专的问题、兴趣与专业的问题、精读与细读的问题。还有,书指什么?包括报纸杂志、网络文章吗?

答:不包括。问题问得很好。我前面说了,我们专业化走得太早了。国外的教育不是这样的,国外教育中跳槽、换专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认识自己的兴趣事实上是有过程的。特别是我们的中学教育已经形成这样一种风格,那时候同学们没有东张西望的余力,没有慢慢发现自己兴趣的空间,而后就盲目地进入了专业,而这个专业又过于强化。另外还有我们社会的功利思想的影响。早期的阅读是应该博杂,而后“专”是没有问题的。日后你要以这个专业为饭碗,名缰利锁之下,你岂能不专?你不要评职称吗?你不要在专业里发文章被同行承认吗?所以专的事情是不用发愁的。没有绝对真理,任何一种观点都是在一定时空下发生的,我这种观点就是在今天这种时空下产生的。在今天这种时空下还用提倡“专”?

问:您觉得做学术不是一件最奢侈的事情吗?您觉得有必要了解一下您身边学生的生存状况吗?

答:做学术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我觉得对国家、个人来说,这是两件事情。在很多硕士阶段的同学犹豫要不要读博士的时候,我都会综合考虑到他的家庭状况。我不希望一个家庭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的同学去读博士读得那么苦,很多年也不能独立生活、赚钱。一个人的选择是很综合的事情,不应该自私,不考虑抚育自己的父母。对个人而言,中学毕业分流一次,你上大学了,有人没上;大学时候又分流了一次,有些人工作了,你读研究生了,而我们现在研究生的奖学金又这样的微不足道,跟没有差不多,那样读来读去的话,你跟老同学比是最贫困的,心态就不好了。所以对个体,做学问毫无疑问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是一件奢侈的事情,而真正做得好的学术又是绝对需要的。我们本来的学术界应该是小而精的,不应该有这么大规模。这么大规模在干什么?其中很多人在忙生存,在骗钱。金圣叹曾写过一个对子,上联是:“真读书人天下少。”学术是一种奢侈,社会养不起太多的学术,必须少而精。

问:近几年,人们对一些经济学家要么成为“御用学者”,要么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有很多看法。您认为一个社会学者如何保持自己独立的个性和学术的自由呢?

答:你从经济学家开始问,我就从经济学家开始回答你。近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一本书——《国富论》,严复翻译的是古文,经济学家是研究一个国家怎么富裕的,不是研究私人如何富裕的。我们很多经济学家只帮助企业和自己致富,这是辱没了“经济学家”这个称号。

问:现在“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很流行,您能评价这样一

种现象吗?这种现象是否会影响学术的纯洁性?

答:我们每个人都是多种角色的结合体。比如你现在是个学生,也是一个家庭中的儿子,还是某些人的朋友。就我来说,有些人说我是个社会学家,有些人说我不是一个社会学家。说什么都不要紧,学科划分都是件人为的事情,而问题是自然的,不是拿单一学科的知识可以透视的。我算个学者吧。除了学者,我还是个公民。我吃着学者的饭,但我同时还是个公民。我和别人一样在社会上生活,我有和别的公民一样的喜怒哀乐,我有和别的公民一样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想法。我刚才不是说要从对日常生活的投入中去增长你的思考能力嘛。公共事务与学术天然地是结合在一起的。当然有人的研究与公共事务相距很远,但并不是没有关联的。远不要紧,还是有关联的,对于社会的良性影响实际上是存在的。

问:您说,学术只是解释世界,它对现实世界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那么,是什么支持着一个学者将其一生投入其中?学者精神上的满足难道仅仅止于单纯的读书兴趣?如果不能成功地参与世界的改造,学者的价值在哪里?

答:是两个动机支撑着我做学术的。我想,如果只存在任何一个动机的话,都是容易动摇的。比如你说你做学术是为了经世济民,经世济民要有实际成果,如果你忙了几十年也没有实现经世济民,你不觉得自己的选择荒诞吗?而经世济民是要有条件的,建议、方案是要被采纳才有效果的。你不是实践者,你不是掌权者,如果你的建议被采纳的概率很小,你当初还愿不愿意进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说,这位同学说经世济民应该是学

者的最主要动力,我要给你泼冷水,你要是抱持这样一个动机,并且是强烈而单一的动机的话, 很可能你最不容易持续下去。如果智力足够的话,你应该看到学术研究能够经世济民的概率很小,那你还要不要做?而我说,实际上还要有一个支点,是什么呢?就是这是一个智力游戏,是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贡献实现不实现到社会层面上都可以。思想领域的人为社会思想库提供一点东西,这个思想库会在明天或者遥远的未来反馈给社会。你的思想被加入到文化库、思想库里面,跟别的因子一起发酵,然后反馈给社会。一个人如果只为学术而学术,不关注养育你的社会,那是没有良心。但如果仅为经世济民做学术,这人大约弱智,根本看不到如何实现,还干什么呀? 我觉得有上述两个动机,才能持久下去。只是经世济民,学术将是单薄的。只有关心非功利的学术,兴趣才是广博的,视角才是宽阔的。有些东西好像没什么用,然而在你关心了以后,你的本领不知不觉大了,你解释社会的能力强了。就说此前刚刚去世不久的我们社会学界的老权威费孝通,至今为止我对他没有过一句话的评论。他刚去世的时候,我接到《南方周末》的电话,想让我说几句话。我说:我不说,我现在说是不厚道,人刚去世,我对他发微词不好。我觉得他是悲剧人物,极其遗憾,改革开放以后没有什么成就。此前在知识界,他是一个受到良好的教育、非常有见识的人,一个睿智的人,但是以后的成果让人实在不敢恭维了。一方面是后来当了很大的官,被约束了,但另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他只有一个经世济民的动机, 他没有一种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的情怀。这是很遗憾的。他跟马林诺夫斯基的另一个学生、他的同学利奇争论过,他说他的旨趣不在于认识文化的普遍规律,只在于中国,在于寻找中国的富裕之路。他自己说,有一段时间他是一个被打垮的人,哀莫大于心死,他早就放弃社会学了。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研究不允许作了。而如果是热爱,为学术而学术的话,不允许做、没有用途,仍然可能喜欢做,不是为社会做,仍然会为自己做。在为学术而学术上,他比不了潘光旦。

问:当读某一本经典著作时,由于读者的理解能力有限而产生诸多困难,甚至第一章就难以理解,您有何建议?

答:循序渐进。先从能看懂的开始看,这书要是一点都看不懂就先放下。没别的好办法。

问:您知道在日本地铁上人们读的是什么书吗?

答:不知道。但我知道西方人在交通道路方面比中国人要明智,很多人自己先开车,然后换乘火车、地铁。因为他们知道每天要在车上度过几十分钟,所以他们通常是有备而来,不是偶然地读书,偶然地读报。有备而来跟偶尔为之就大不一样。

问:英国有句谚语:“有学问无阅历,不如有阅历无学问。”老师怎么看?

答:这谚语从中国语言里可以找到许多近似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孔子还说过一句话,跟这句话更相似,“行有余而学文”。我从来没有轻视过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我对这样的人非常尊重。我不是很看得起对世事没有什么感觉的书呆子。但是个人是极其有限的,一个人只能亲历一段时间,而如果读过书就可以了解其他时空中发

生的事情,这种经历跟你亲身经历有很大的不同。亲身经历是深刻的、直接的、全方位感受的,但也是非常有限的;而读书,虽然不是直接的、亲身的,但如果你对上下五千年有一定的了解,并能与你切身的一小段深刻理解结合起来的话,你就挺厉害的了。相反,二者相背的话,或许你是一个很好的实践者,你在你有限的时空里游刃有余,你活得可以说有血有肉,对得起你的父母亲朋。但是我们人类不是生活在短暂的瞬间,而是一种有历史的动物,我们因为有历史而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感觉,我们因为有历史有文化积累而变得格外的有智慧。所以你要完全离开了这些东西,离开了书,大概很遗憾。

问:您对学术界打假怎么看?

答:这些活动挺好的,但我看来,这些事情对于改善学术界、净化学术界,是小打小闹、杯水车薪,没什么用。根本大问题没有解决,打假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中国的假冒商品能靠王海来解决吗?根本不行。虽然不行,但是这些个体的行为是道德的、正义的。

问:您对大学的事情怎么看?

答:学术界的事情,走到今天已经令我失望到极点,已经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比如我曾经认为应该教授治校、学术民主化,现在我放弃了这个主张。十年前这么做还可以,十年后很多学校——我们学校还算好的——教授团已经乌七八糟了,过半的人根本不够格当教授,还有拉帮结派的现象,一个系半数教师是首领的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能谈什么教授治校了。如果一个系已经被大量不称职的人占据, 你问我这个系该怎么

办,我不知道怎么办。好多院系都是已经无可救药了。中国的事情不能细看,外国人不了解中国情况,他们见林不见木,我们也可能犯见木不见林的错误吧。不能细看,包括教师,也包括同学们。同学们是最无辜的,不管你们犯了多么严重的过错,比如在我们课堂上,我的课上经常有三四个人迟到,这是我在北大、人大都没有感受过的。这事也不全是同学们的错,对不对?你们都长这么大了,怎么这样啊,还不是一些教师给惯出来的?比如说,于老师不在,说点于老师的坏话,是吧?于老师那天跟我说,北大毕业的一个天才少年,正在香港读书,前几天来看他,于老师就跟我说,这孩子上他的课呀,一次都没来过,然后考试不知道怎么的,考了个第四名,真有天分。他一次不来,你还给他分啊?我早就叫他滚蛋了。他不来上课就是教师们惯出来的。我这个课迟到还算好呢。我在美国念书,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现象。这堂课过了 30 分钟一个同学刚来,下堂课还是这样,讲过几次没用,下次还这样? 你是在侮辱你自己,还是在侮辱我呀?所以我说细处不能看,细处真的不能看。我们是干什么不吆喝什么,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没有神圣感。我在这里待了 50 多年,我看到了我们社会的若干细部,就这样我们能在世界民族之林里获得领先地位?当然这不影响我们看到自己有起色的地方,是吧?可能外面的人更能看到,因为外面人能跟你以前比。但是内部人看到很多细节是无可救药的,是悲哀的,有什么办法呀?

附录二
三校论文选编前言

这部文集包含的是从北大、清华、人大三校社会学系 2002 和 2003 年的大约 100 篇硕士论文中挑选出来的 8 篇论文。

我们为什么要选编这样一部文集?

为了给社会学系的学生们和姊妹学科中关注社会学的同学们留下一份记录,提供一点参照,树立一支标杆,注入一种激励,举起一面可供讨论和批判的靶子。

前不久与北京大学地理学家唐先生交谈,说起中外社会中敬业精神上的巨大差距。唐先生说:在美国读博士就是下地狱,必须一本一本地、扎扎实实地阅读大批的书籍,容不得半点含糊;经历此番炼狱的人大多终生保持着认真严谨的作风。我以为此言是点睛之笔。一个社会中众生们不求实、不敬业,必然是它的精英率先告别了求实和敬业。只要一个社会中精英们的精神还在,不信东风唤不回。换言之,要改造一个社会的作风,首先要从它的精英开始。不然就是伪善,就是奴隶主的哲学,就是注定不会得逞的痴人说梦。现代社会是分工的社会,其精英也在分流。政治精英和企业精英属于其他范畴,而学术领域则是我们的分内之事,未来的学术精英是从我们这里产生的,我们对那一群体的优劣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除此,未来其他领域中的多数精英都将拥有较高的学位,我们应该在大学的炼狱

中为他们打上一记难以磨灭的烙印。

认真,学好手艺,做出好活,就是我们在自己的领地中企图推动的事情。

挑选论文是个老大难,尤其是在中国社会中。择优通常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制度与人格。我们避重就轻,甚至可说逆潮流而动,选择了后者。我们以自己的人格作了抵押,准备挨骂,准备接受公共舆论火焰的烧烤。筛选的大概程序是:我们四位(孙立平、林彬、刘世定和笔者)从各自的学校中挑选出一些论文作候选,共17篇,共同讨论后确定了8篇。

我们希望这是开始,不是终结。希望明年这个时候,能够拿出更好的一册三校硕士论文集;希望这个工作能一年一册地持续下去。开端的这一册选用了两年中的论文,是为了质量更好一点,以壮声威,振奋师生。当然,事实上也可能是暴露得更充分,最终更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本书的前三篇是2002年的论文, 后五篇是2003年的论文。同一年中论文的顺序是按照作者姓名的拼音排列的。

感谢山东人民出版社接受这样的纯学术作品,感谢该社编辑王海玲女士为此付出的辛勤劳动。

(《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 2002~2003 》前言)

这本文集是山东人民出版社去年出版的同名文集的继续。

去年的文集选自2002和2003两个年头, 今年的选自一年。去年的8篇论文是从三系大约100篇硕士论文中挑选出来的。今年的虽然出自一年,但因招生扩大了,仔细数了一下,是

从101篇中选出的。其中人大53篇,北大41篇,清华7篇。

编委有了较大变动。我已经从人大调到北大,索性就承担起北大的工作,不必麻烦别人了。人大的工作转交给人大同仁中我最钦佩的潘绥铭先生。孙立平先生退役,由一直关心并支持这一工作的沈原先生接替。我和立平是老朋友,多年前有过一同办刊的愉快合作。立平坚持退出的原因是,现在学生的学习态度令他失望,他没有保持住文集质量的信心。我基本上认同这一事实。我今年大约阅读了三校的30余篇论文,质量都是属于上游的,多数依然差强人意。好在挑出的8篇似乎还可以。不能说"今年花胜去年红",还算不逊色于去年。其实正是论文大面积的"低质"(说不上"滑坡",因为我们不曾拥有过一个"高峰"),才使我们萌生了"立一标杆"的愿望。因此可以说,孙君不做的理由,正是我要做的理由。我们是老朋友,有诸多共识。在这事情上的做与不做,纯属性情所致。

今年挑选的程序依旧。沈原、潘绥铭和我,分别从各自系中挑选出一些:清华3篇,人大6篇,北大5篇。三人一同讨论,从这14篇中确定了最终的8篇。从各系中初选的程序不是民主的,而是以人格为基础的,以我们三人的人格作抵押的。最终的评选亦没有配额的原则,因为我们无意贯彻平均主义。如果说清华选入的比例高(7篇论文中选中了两篇),那不是前定的配额,而是比较的结果。如果说在去年和今年的文集中,三系的比重还算平衡,也不是刻意而为。我们的工作还将继续,以后的文集会证明这一点。

去年的文集问世后,引来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称赞。美国

洛杉矶加州大学人类学家阎云翔教授说:“这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一本好书。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它鲜有时下学界颇为流行的空话,套话,玄而又玄的废话,以及曾经在别处不知说过多少次的二手话,该书的几乎每一页都含有新的信息。”《社会学家茶座》执行主编王焱先生说:“有明一代,学风空疏浮荡。大儒顾炎武对此曾痛下针砭说,古人采铜于山自铸铜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这些青年学子都能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之下,自出机杼,走扎扎实实的‘自铸铜钱’的学术路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大都力图避免以往社会学理论研究过于思辨空灵,和经验研究囿于实证而缺乏理论思考的缺陷,努力实现两者的相容兼顾。在我看来,这就把握住了社会学的精义。”北京大学王汉生教授说:“期待一年一册的《选编》成为精品,成为社会学成长发展的永远的一个窗口。”

这令我们欣慰:“立一标杆”的目标初步达到了,重要的是继续。老实说,在全民腐败和外物诱惑的大形势下,中国学术正处在低谷。多数学人已不做学问。但正如中国人普遍身材不高,仍有姚明出现,这是人口基数所使然。中国现在有51个社会学系,124个社会工作系,至少5000名以上在校研究生。这个基数应当可以孕育出社会学界的“姚明”。北大、清华、人大三校位于中国高校的塔尖。我们占有了中国最出色的生源,也就负担了义不容辞的责任:推出“姚明”,将他输送给中国学术界,以他激励其后的莘莘学子。

我们自知本书不会成为畅销书。它的适应范围是社会学同仁和爱好者,以及高校中社会学姊妹学科的师生们。本书的出版和销售正处在艰苦奋斗中。但这毕竟是第二年了。我们相信,只要能走过第三年,我们就几乎会永远做下去。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我们不是“愚公”,没有“感动上帝——人民大众”的福气。我们只想为本书赢得一个“小众”,造就一种小气候,促进一个小学科的渐进前行。

(《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 2004 》前言)

这本文集年满三岁了。

规模依旧,内含8篇论文。前两集都是从大约百篇论文中选出的。第一集选自2002~2003两届毕业生,第二集虽只选自2004年的毕业论文,但人大因改制(硕士生由两年制变三年制),该年两届毕业生同时毕业。本集没有这些因素,所以被选对象相对瘦身,只有84篇论文。

编委依旧:沈原、潘绥铭和我。

程序依旧。沈原从清华的10篇论文中选出4篇,潘绥铭从人大的33篇论文中选出5篇,我从北大的41篇论文中选出5篇。我们经阅读、商讨,从这14篇论文中选出本书中的8篇。

这本文集的质量,依我看,比前两集要稍好一点。这足令编者欣慰。但不要乐观地以为这是三系发展的势头和规律,明年就一定好于今年。除了今年的文集略好于去年的文集外,我还有另一判断:今年三系论文的总体水平并不好于去年的总体水平。

北大去年还有数篇论文与被选中的三篇相差无几,令我们颇费斟酌,今年要容易挑选一些。

清华从 10 篇论文中产生了三篇,说明了这个系在起飞。但是该系的其他论文与这三篇论文有明显的差距。

人大的情况特殊一些,其毕业生是清一色两年制的。多学一年岂是儿戏?且实际上,两年制比三年制相差的应该不是三分之一。目前学生们在择业、考研上投入甚大,几乎要花费将近一年的时间。减去这段消耗,两年制比三年制在学习的有效时间上少了几乎一半。反映在这本文集上的是,人大在 8 篇论文中只占 2 篇。

一句话,今年的总体水平并不怎么好。套用 NBA 的话,“板凳深度不够”,也就是说,优秀论文的真正候选者数量不足。

除了改制,还有什么原因影响硕士论文的质量呢?我以为,择其要者,有三。

其一,是态度问题。相当数量的同学对硕士论文的重视程度严重不足。如果我们以某种制度或感召力使得同学们重视毕业论文的写作,我以为,一个 30 人的年级中会有 10 人,我们三系共 27、28 人的论文会达到或超过这 8 篇论文的水平。

其二,怎样安排时间,减少择业和考博的消耗,怎样将授课与论文写作结合起来,是我们需要认真思索的问题。毕竟,论文是一项重要的锻炼。也毕竟,最终走上两年制的不会只是人大。

其三,我们在教学上,或曰学术上,遭遇了一个障碍,那就是一个“新八股”。回想十余年前的社会学毕业论文,述评西方理论的占了大多数。以后大家相约转向,开始了对自己社会的经验研究。而我们不可能不努力区别于未受过学院派社会学训练的那种社会调查,便要求同学们显示出理论训练和文献功夫,教育同学们以某些理论指导其对经验现象的分析。学生们生怕被扣上缺乏理论的帽子。于是我们看到了相当数量的论文,油水不相融。论文前一部分的理论综述花团锦簇,但是同后面的经验调查,好一些的缺乏有机的、深入的关联,糟糕的关系生硬、勉强,多数都伤害了同学们以自己的头脑深入思考调查结果。

这样,什么是理论便成了施教者与被教者需要共同思考的东西。不管理论是什么,它都绝不是标签。我们教了这么多理论,绝不是要教你们贴标签,找护身符,而是要增长你们的分析能力。就如同你学过少林、武当等等,完全不是要你在遭遇实战时能摆出一个少林的招式,而是要你通过学习少林武功而增长了攻防腾挪的本领,实战时发挥自身,不可拘泥。韦伯的理论刚好能帮助你解释一个微观问题的可能性是万分之一,而韦伯的理论能帮助你看他老人家怎样分析他的问题,有所裨益是确定无疑的。我最害怕看到同学们贴大标签,比如韦伯和帕森斯的理论。贴小标签还好一些,说明你知道的理论挺多,它和你的调查有关联的可能性也大一些。

我以为一篇硕士阶段的优秀论文,应该是经验研究,同时又能显示出理论修养。显示的方式可以是多样的,不应该是刻板的、束缚的。其实,你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之所以重视这些细节,就显示出了理论修养之高下,不必贴标签。我对同学们的期望是保守的。我不奢望他们有理论发现,只希望他们因理论训练而善于观察并有所发现。理论同武器不一样。好的武器常常就是好的武器(当然也有高射炮打蚊子的问题),好的理论必

须适合于被解释的对象才是好的理论。所以,我们不能在同学们的思想中强化一种意识,比比你们谁的武器更好;而是要强化另一种意识,在某一事件和问题中,努力发现一点别人没有发现的、有意义的事实和细节。

我说的事情好像同这本文集没有关系。实际上,这些想法完全是产生于阅读同学们的大量的论文,比较成功的和不成功的。不成功的远比成功的更多。而即使在比较成功的论文中,上述的“油水不相融”的缺陷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古人说:一山放过一山拦。恰恰是比较好的同学眼下面临着跨过“新八股”这一障碍。迈过它,你将拥有独立的思考。那不是不学无术的独立,而是穿越了诸多理论后仍然保有的独立,那是弥足珍贵的。

为了向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也为了给三系师生一种纪念,本书刊出了今年三系的全部硕士论文题目和毕业生姓名。由此,也从另一个角度呈现出上述问题。多数题目是“两段式”:理论与经验。理论与经验的结合是再好不过了,但是二者的结合不必这样表面。如此表面的拼接,导致题目冗长。当年费孝通的论文:《江村经济》,何等简洁。内容也不应该啰嗦,而题目是必须简洁的。这一点意见也供同学们参考。

(《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 2005 》前言)

果树的产量不是恒定的,用果农们的话说,有“大年”,有“小年”。那原因不是门外汉们说得清的。以门外汉们的眼光看,果树的“小年”颇可谅解:去年产量高,消耗大,还能不让歇歇,

哪有连续高产的好事?

教师们常常觉得,他们送走的一届届学生的质量竟像果树一般,也分大小年。自然,那是很不相同的事情。果树的大小年指的是同一棵树或同一座果园,在不同年份中的产量比。学生中的大小年则指不同年级的同学,在不同年份中所续接出的波峰和波谷。单个与多个主体的差别,决定了后者的原因要另外寻找。寻找那原因一定是有趣味也有意义的。或许是同学间的互动起了较大的作用:一两个天才少年,或性格异常活跃的少年,激活了全班同学。或许“桨手理论”起了作用:有些人捆绑在一起互不往来,死气沉沉,换个组合就会沟通和双赢,即有些班级占了组合优势的光。这话茬且供有心者慢慢琢磨,我们无暇深论。

这里要说的是学生们的论文,论文也有大小年。论文大小年的原因又不同了。这茬学生潜力好,照说应该毕业论文也好。但是未必。一些匪夷所思的原因竟会影响某届学生的论文质量。什么原因?有心的教师应该能看到,学生们当然个个心知肚明。

春江水暖鸭先知。是否也可说秋江水寒鸭先知?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没有人比毕业生们更了解就业形势了,而今年的就业形势,寒似秋水。学生们早就明白了,何况这感觉是传染的,是聚合裂变的。对多数学生而言,论文哪有择业要紧。于是多数学生为择业投入了大量时间,在极大程度上损伤和牺牲了论文。

今年的论文是个小年。这么说,别影响您小瞧了这本论文

集。这是我们三校论文的第四集了,本书质量同前几本相仿佛。为什么"小年"对论文集影响还不算大?因为我们这三系的毕业生数量大,且其中有相当比例的学生保送读博、考研读博或是申请出国留学,他们未入择业大军,不受就业形势的影响,尚可专心读书撰文。借用 NBA 的术语,尽管今年的"首发阵容"还行,但是缺乏"板凳深度",可供挑选的基础极其狭小。以往的挑选更费神,因为总有一些篇什和中选的论文相差无几。今年不同,好论文少得厉害。本书之外,除少数几篇,水准陡然下降。具体地说,今年三系共有 94 篇硕士毕业论文,其中清华 9 篇,人大 42 篇,北大 43 篇。沈原、潘绥铭和我分别从各自院系选出 3、5、5 篇候选论文。我们共同研究,从这 13 篇论文中挑出 8 篇,组成本书。

为什么要说大环境?中选论文的作者不是较少受到外部严峻形势的影响吗?其一,这套论文集将保留和呈现三系同学的学术轨迹。知道那些深浅不一的脚印所履践的道路之状况、路旁之情形,会为理解这些轨迹提供立体多维的背景。

其二,我们编辑本文集的目的,既在历史,更在当下。我们希望它有助于全国高校社会学的教学和论文写作。因此,正在且日益对同学们的论文写作发生重大影响的外部环境,应该进入我们的视野,成为我们的议题,即使不及深入研讨,也要郑重地提出。其实,择业影响论文写作早就不是新鲜事情了,是其今天之陡然加剧,使我们警觉到这件早该注意的事情。

论文写作是高度综合而浓缩的东西。对指导教师而言是综合性教学,对学生而言是综合性智力活动——综合了选题、文献、调查和写作,就判定学生水平来说是最综合的尺度,是考试远远比不了的。如果因为外部环境的干扰,轻视了论文写作,将是教学全过程中最大的遗憾,将是学生们最大的损失。这不仅指硕士论文,同样包括学士论文和博士论文。而长期以来,在教师们与就业市场的博弈,在教师与轻视毕业论文写作的学生的博弈中,我们一直是输家。败绩的关键是,我们的制度不行,它不能迫使学生们拿出全身心的力量去作论文。

积数年之思考,我想到的制度化措施是,要求学生在最后一个寒假前完成论文。这样,教授们在筛选保送生的时候,就不是仅仅依据学习成绩,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依据论文质量。这无疑可以推动相当一批学生写好论文。找工作的同学反正在最后一个学期是不可能专心学习的,以上安排可以省出一个学期,避免了论文写作与找工作的冲突。这期间,读博的同学,乃至准备工作的同学,都可以继续读书,因为读书不需要写作论文那样的整块时间。甚至最后一个学期还可以安排课程。因为写作论文的时间是学生自由的时间,在用人方的压力下,同学们会牺牲论文去参加择业单位的实习和考察。课程如果严格点名制度,可以和用人单位抗衡。但这样选择之前,学校和教授们要想好:我们能否打过外部势力,否则压力太大不给出路是否恰当。硕士三年制,作以上调整,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两年制中写作论文似乎只剩下半年(前一年授课),但是我认为,及早选择题目,半年时间专心致志,调查和写作是可以完成的,且胜过多方搅扰和切割下的一年时间。这方案无疑不是最好的。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已经不可能在静态的环境中思考教学制度了,必

须在与诸多对手的博弈中安排我们的制度。

我深信,当80%的学生都开始认真写作论文的时候,中国的高等教育将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我们的论文集也肯定不是今天的水准。

请几位教授一同议论如何提高论文水平是去年就产生了的愿望,今年终于实现。本书附录了座谈会纪要,从中可以看到教授们对目前论文的总体评价,以及促进论文提高的制度上的考虑。希望这篇纪要能引起同仁们对这一问题深入广泛的思考。

关于本书中看到的问题,我只捡一个最小的说,就是论文题目。这八篇论文的水准当然高于硕士论文的平均水平,但是"起名"的水平一点不比平均水平强,其风格和多数学生们的论文题目一样,统统是三段式或者两段式。我不懂得这种结构复杂的命名方式是怎样在学生中产生和流行的。前辈的经典似乎没有提供这种范式与暗示——《法兰西内战》《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礼物》《波兰农民在美国》《街角社会》《江村经济》。题目既要反映内容,又要便于记忆和流传。要全面、充分反映研究对象、方法、观点,题目势必冗长。而题目太长显然不好,读者记不住。两个目标妥协下来,题目能反映出研究对象就不错了,你所珍爱的那些独到的方法和观点没有反映到题目上怕什么呢?不是正好构成了题目和解题、谜面和谜底的呼应吗?文集中的好多题目我都看不下去,向其中一些同学建议,改成了现在的样子。我都不用提醒是哪几篇,一眼就可以看出两种风格。论文中更多的问题,我们日后再议。

希望更多的朋友读我们的文集,加入这一话题。

(《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 2006 》前言)

三校论文集的选编过程是,沈原、潘绥铭和我互换各自从本系挑出的论文,阅读后碰头商议。自然,交流从碰面前的电话中已经开始。

我电话里问沈原:"今年贵系论文如何?"他说:"两篇不错,不幸都是我的学生。都选恐不妥。"我们早有约定,论文集的质量压倒一切,其他考虑均在其次;但如果不是明显高于其他论文,一位老师指导的论文不上两篇。所以我说:"都让我和潘爷看看吧,为保险起见,多拿出几篇。"这样,清华今年一共才8篇硕士论文,送上了5篇。电话里我也托付沈原:"我给你5篇北大的论文。其中童素娟的论文是我指导的,您看仔细了,帮忙把关。不上童文,是帮我解惑——我看的遍数太多,已经没有分辨力了,千万别让人戳我脊梁骨。"

我们碰面了。我说,清华的5篇论文,沈原指导的3篇分列前三名,明显高于后两篇。个人洁癖小事,论文集质量大事,择沈原指导的两篇入选。潘绥铭赞同。我们从人大的4篇中选出两篇,三人均无异议。沈原从北大的5篇中提出4篇。我再次郑重提出:"童素娟的论文你确实觉得够格吗?我有洁癖,你最清楚。"沈原正言,童文应当入选。潘绥铭对童文提出了小的意见,但在我重申严格把关后,依然同意入选。

我相信我对清华论文的评价不会走眼,也相信和接受了沈潘二位的判断。我的信任基于,我们是君子之交。语言的学问太

大,如果语义上较真的话,不能说君子之交的当事者都是君子,这话还可以理解为君子式的交往。而我的信任基于:我们是君子之交,且我们是君子。这不是有自吹自擂之嫌吗?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在彼时自吹自擂的说辞,在此时可能已成自谦自嘲。就像今天你夸一个人老实,人家会满心以为你骂他。君子在今天还有名声可言?两年前,我们三人电话商议碰头地点。我说:找个地点居中的餐馆,我们十点钟碰面,那时餐馆还清静,讨论完吃个饭。沈原坚持不肯:"什么时候了,在餐馆里摊开论文,一本正经地讨论,太傻逼了。也夫,咱丢不起这个人。还是二位辛苦点,先到我们办公室,完事了出去我请客。"

这是一点内幕,我未经他们允准,擅自披露了。都是边缘人的小故事,没人关心,不起波澜,只为三两同人聊备谈资。

言归正传。今年的论文,北大66篇,清华8篇,人大48篇,共122篇。文集中依旧是8篇。三所名校,十五挑一。文集的质量您就放心吧。

太多的好论文,比如15篇,还真的挑不出来。因为形势依旧不乐观,认真写论文的只是少部分同学,平庸的论文是多数。就是说,名校的氛围也不尽如人意,成才居然还要靠小氛围。几年论文编下来,感想总有一点。我觉得,有些教师总能指导出好论文,想来不是偶然的。北大的杨善华、王汉生老师,人大的郭星华老师,指导的优秀论文颇多。应该谈出其中的经验,用当年的话说,传经送宝。从未请教过老杨,但老杨的办公室在我隔壁,总能听到里面师生的热烈讨论,后来的成果说明这些交锋颇有斩获。我和沈原联系多。电话一过去,那边就会说:正和学

生谈事呢,一会儿给您打过去。以至于现在我一通话就问:现在能说话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教授的投入,是优秀论文产生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但大而化之不行,重要的是当事者从细节谈起。

我们三人论文讨论完毕,开始吹牛,沈原发了牢骚:同学的论文不能让他们自己选题。我是清华社会学系出名的暴君,题目我定,不能让学生定。这些学生老变,他今天选这个题目,我跟着读了一些书,明天变了,我又要跟着重新读书,受得了吗?还有,今天的学生都是经残酷科举上来的,哪有自己的兴趣,他不会选题。对这番高论我不是完全认可,但也赞同几分,便随口帮了一句腔:当今的学生中绝对没有曹禺,一个也没有。当然,沈原成功经验之关键须另论,但下了这么大工夫,不可能不成功。

我的绝非成功的经验完全不同。我的硕士生绝大多数是农村背景。我都是让他们给我讲他们村庄中的故事,有趣的勾当和精妙的博弈,然后为他们敲定。当然,如此也是因为我没有课题经费,搞家乡的问题最便宜。

我觉得,师生对论文频繁深入的讨论,是论文成功不可或缺的环节。这讨论可以是师生对坐,也可以在同门中,在师父、师兄师弟之间。不少教授为其学生组织读书小组。更有一些教师有项目,需要同学参与调查,有些同学的论文就产生于其中。但时下有课题的教师如过江之鲫,为什么成功的教师和学生少之又少?大半是课题都为稻粱谋,可以不论。少数努力的,也未准都能成功。成功的要素之一:项目过程中师生的讨论质量高,

且参与课题的同学们在其中的讨论质量也很高。良好的小氛围哺育滋养了同学,造就了优秀论文。我从来没有课题。我学生的读书小组我每两回出席一次,不是偷懒,是觉得每次都出席并不好。今年我的两个硕士生的论文初稿都经过了我们读书小组中其他五位同学的切磋研讨。童文的一些观点是大家讨论中产生的,我必须承认,且极为欣慰,讨论中几个同学想到了我这个老师没有想到的东西。

我们几位还有一个共识,写出优秀论文的同学不一定是最聪明同学,但多半是最努力的同学。以童素娟为例,她绝不是最聪明的同学。她的采访整理出几十万字,论文写了四遍,局部修改不计其数。我相信,这篇论文会令同学们对她刮目相看。前几年中选本文集的一位清华硕士生,沈原多次对我们讲他糊涂,说他被孙立平老师接二连三的批评说怕了、吓傻了,想来那也不是一位天才少年。但是他们的论文都成功了。这些案例不断地提醒师生们,态度决定一切。当然一切事情都有前提。我们说的是三校的学生。这批科举的佼佼者兼幸运儿中,不乏自甘平庸者,自作聪明者,自欺欺人者。如此世风,不这样倒令人费解了。

于是关键的问题是,热爱学术的教师,须潜心经营自己的小环境。社会的氛围,学校的制度,都不是我们管得了的。我们对它不存奢望,它不过分干扰我们就该庆幸。成功的小环境该如何打造,是绝大的、成败攸关的问题。或许热爱学术的学者在今天的学界并非多数,但他们毕竟还够得上一个群体。共议营造小环境,应该是我们共享的大话题。它可以是理念上的思考,

制度上的设计,但各自的经验绝不可以轻视和忽略。这些经验,谦谦君子或许以为不足道,但对莘莘学子乃至他们的老师来说却弥足珍贵。

一篇前言,不能负载这样的讨论。只是提个话头,邀集同道,找个平台,各叙彼此经验。不亦悦乎,必有我师焉。

(《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 2007 》前言)